

中文无治主义图书馆 | 中文無治主義圖書館



# 高度衍生

加速主义无法彻底决裂

威廉·吉利斯

威廉·吉利斯  
高度衍生  
加速主义无法彻底决裂  
2015-08-08

<http://humaniterations.net/2015/08/08/highly-derivative-accelerationisms-inability-to-make-a-clean-break/>

[zh.anarchistlibraries.net](http://zh.anarchistlibraries.net)

2015-08-08

今天，极左派有一种越来越强烈的危机感。在二十世纪的过程中，他们把自己绑在隐含的原始主义上，现在这艘船正在沉没，许多左派正在拼命寻找出路。

Alex Williams 和 Nick Srnicek 的《加速主义政治宣言》（简称 MAP）是那些抵制资本的人最近试图将自己从这种死气沉沉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并制定一条实际上“用他们的话说——与抽象性、复杂性、全球化和技术的现代性相适应”的前进路线的尝试之一。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未能引起街头激进分子的注意，但《左翼行动纲领》仍然成为了某些在激进主义圈子里有声望的“反学术”学者的重要文件。在许多方面，这个“左翼加速主义”项目带来了急需的理智之风。当涉及到在左派中越来越流行的荒谬的懒惰和一概而论的否定时，终于有一个声音叫出了皇帝的裸体。正如一年后出版的《加速主义读本》所说。

作为霸权的新自由主义声称没有其他选择，而既定的左派政治思想，小心翼翼地避免启蒙运动的“元叙事”，对任何与资本污染的技术基础设施有关的卡车都保持警惕，对整个文明遗产过敏，并将其归纳为“工具性思维”，显然未能提供它坚持认为一定可能的选择。

在很久以前就拒绝了大众政治组织的脱节恐龙之后，极左派越来越多地接受了退缩到反动的地方主义的故意脱节，作为唯一的选择。但这两个方向的特点实际上都是远离未来，而且越来越多地远离所有向前寻求和探路的警觉性。因此，左派作为一个整体，在许多方面已经被我们不断变化的世界所迷惑，甚至受到了创伤。今天，它似乎只限于修饰其牢房的墙壁，并假装“没有未来”完全是其最初的计划。它所提供的一点抵抗力已经缩减为单纯的拒绝，一种仪式化的、空洞的怀疑，往往默认为将我们面前的历史看作是一场需要经历的风暴，而不是需要确定的东西。由此产生的孤立的死亡漩涡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试图通过“反动地迷恋纯洁、谦逊和对批评和抗议的个人满足的仪式及其脆弱和短暂的集体形式的感性依恋”来重新获得感觉和审美特质。（同上）

但是——随着互联网已经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左派的坚守者终于被拖入了一个基本上没有他们的世界。见证了追赶所有这些技术东西的疯狂尝试；向所有人保证，在上个世纪的科学发现中没有任何打破范式的东西，或者说，人们基本上应该能够通过一些剪报

当然，谈论这样的愿望或动力，在加速主义的话语中显得非常不合时宜，因为加速主义希望与超人类主义保持足够的距离，以避免显得认真和不酷。而这基本上就是问题所在。这里没有什么新东西，只是一种试图为恢复相关性找借口的牢骚，而这种牢骚到头来更多的是为自己的同行辩护，让他们看起来很时髦，而不是真正恢复相关性。

简而言之，加速主义就是那些过时的马克思主义和大陆主义的垃圾。孤立的精英主义和他们现在声称要打破的那些镜头中固有的地方主义和直接性的反智潮流的混合物。

当 Williams & Srnicek 出版 MAP 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在一些地方非常困惑地说了一句“很明显”，同时对它缺乏进一步发展的勇气感到恼火。这是一个尚未出生的立场，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它注定要作为一种轻微有趣的时尚死在学术界的一个小角落里。没有大量的论文可以给它带来生命。

今天，许多人都有一种普遍的感觉，即未来正“向我们走来”，就像一列火车向一个被绑住的少女驶去。在其最好的情况下，加速主义提供了一个希望，即我们可以扭转对这幅画中的惯性的识别，并在人们心中重振这样的观念：是我们在加速走向未来。然而，在其最坏的情况下，加速主义呈现的是一种虚无主义的投降，或者是一个专制和精英主义的左翼的愿景，但它仍然可能通过寄生而生存。通过紧紧抓住理性、技术等，以保持对“人类生活”这一僵化、静止的空间的喂养——大陆上如此多的论述的主题，现在就像一层又一层坚硬的败类，其实践者不愿意开始擦洗它，并在这样做时承认他们的失败。

那些准备放弃与原始主义联姻的左派分子无疑会继续寻找前进的道路。一个能够将他们拖入后图灵时代的路线修正。我等待着那一天。同时，用尼采的话说，事实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东西。

费。两者都陷入了对普遍性、世界性和认真的好奇心的日益非理性的拒绝的牵引之中。

我提出右翼加速主义最糟糕的变种，是因为我不相信左翼加速主义可以与它的黑暗面分开。我不确定它是否能真正标志着与原始主义的决裂，这种原始主义实际上定义了今天的左派，而没有与大陆和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许多包袱决裂。然而，我们也不清楚，如果没有这些包袱，加速主义还会剩下什么。

例如，“异化”的概念在加速主义的文本中往往是非常重要的，坦率地说，它往往是一个愚蠢的、脱离实际的、仅仅是令人回味的印象。一切都是异化；没有什么是异化。一个没有任何形式的异化的宇宙将是一个空洞的、同质的、无差别的宇宙。即使我们回到一个所谓更具体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版本，人们也很想叫喊，无论是前资本主义的工匠还是资本主义的工厂工人，首先都不应该选择在心理上认同他们的劳动产品。当然，这里也引用了“人的本性”。

我强烈怀疑不可能以任何形式的实质内容来具体定义“异化”，同时又与该术语目前的使用方式相类似。我更赞同《异化主义宣言》中相对轻视的做法。“好吧，我们被异化了，但我们曾经没有被异化吗？”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对我们的条件、物质或社会条件有多少代理权。智人，像所有生物一样，总是被迫做一些事情。丧失理想状态的神圣故事是一个反动的故事。

然而，如果你用枪指着我的头，要求我为“异化”这个词想出一些定义，我可能会保留其负面的含义。然而，我想说的是，在我们今天的社会中，技术发展和参与的潮流正在最小化而不是加速异化。而“自然条件”，或原始智人的狩猎采集状态—无论与周围环境有多么紧密的联系—仍然代表着难以置信的疏离程度。毕竟我们的神经网络被深深地禁锢在我们的头骨中。默认的人类形态只允许最微小的针孔渠道与更广泛的宇宙互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对自己的理解和能力的加速丰富和复杂化，以及重新配置自己或相互沟通的能力，除了加深疏离感之外，还有什么。科学和技术最终会减少异化。如果没有技术或工具，就没有办法扩展我们与宇宙接触的深度、直接性和根基。例如，技术/语言扩大了我們彼此交流的能力的带宽和范围，这是一个漫长而缓慢的攀登，其顶峰可能被铸成真正的电子心灵感应或心灵融合。

来获得。这常常被表述为“控制论”—某种品牌的左派试图用这种方式轻蔑地概括所有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博弈论等（即 50 年代以来科学范式的几乎所有进步），他们在本科课程中没有被提醒过。例如，请注意 Tiqqun 关于生命力的疯子式的崩溃，或者隐形委员会在《致我们的朋友》中迟来的让步，也许他们确实需要了解所有这些技术的东西，以及他们在第 31 届混沌通信大会上试图对黑客进行演讲的尴尬（对所有各方）。

对于无治主义者来说，值得关注这些痉挛，因为这个重构的时刻将为左派未来的任何新蜕变奠定基础。它能否重塑并将自己从虚无主义与组织主义的泥潭中解放出来？它能否整合上个世纪的洞察力，不仅适应我们现在的景观，而且重组自己，在我们面前的所有复杂性和不断变化的背景中开辟一条前进的道路？能否从非无治主义的左派中拯救出什么？

遗憾的是，在加速主义的案例中，我们似乎不得不继续等待一个答案。这个小的学术潮流可能最终会打开一些窗户，但它带来的“新鲜空气”却弥漫着尸体的灰尘。

在其最好的时刻，这种加速主义说的正是无治-超人类主义者和几乎所有直接了解情况的人长期以来的论点：“我们的技术发展被资本主义压制，就像它被释放出来一样。……这些能力可以而且应该通过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限制而得到释放”。

但这一点不值得称赞，加速主义的直接失败更令人担忧。首先，它未能准确地诊断出推动当今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是立即解放的，因此它提出了一种错误或混乱的紧张关系，即必须加强“坏”才能取得进步—而事实上必须加强的是已经存在的好，一旦准确识别，以及利益。第二，它试图在否定地方主义的同时，偷偷地否定自下而上（好像这两者是完全等同的），这样做显示出它只是一种左翼自由主义学术精英的最新载体，他们鄙视权力下放，渴望回到他们可以再次作为事实上的技术官僚进行统治的环境。

“加速主义”在某些圈子里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诽谤，显然，任何使用它的行为都假定某些东西必须被“加速”，但就我所看到的，由 MAP 预示的“左翼加速主义”还没有特别明确或确定那是什么—除了一些笼统的抽象和印象主义语言。而且，它相当坚定地避免处理任何真正的细节，即这一切应该如何解决。

相比之下，加速主义对资本中的矛盾力量进行了不同的分析，将坚持生产力的释放所带来的持续的活力和人类的转变，认为有可能与它们的革命力量保持一致，但反对驯化，事实上，唯一的”出路”是进一步陷入

从一个非常积极的意义上看，这很容易，但语言却令人担忧地宽泛。虽然知道”in”指的是向内的什么方向会很好，但在”out”周围使用引号的情况下，会有更多的麻烦。究竟什么被设定为我们试图逃避的东西？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人们怀疑缺乏明确性是故意的，这是一种修辞手法，目的是为了吸引人们，而不是真正地致力于一种观点。但实际上，这样做的结果是让像本杰明·诺伊斯这样的人把这种立场描述为要求”多工作、多生产、多消费”。

即便如此，左翼加速主义者仍然不愿意真正解决细节问题或提供实质内容。而当他们确实接近这个过程的实际情况时，他们有时会证实每个人的恐惧：越来越深的剥夺导致某种突破点的出现。换句话说，这正是我们都知道在历史上完全有效的”使事情变得更糟，直到它们崩溃”的老一套立场，就像刚果村民被比利时任务负责人砍掉双手，屠杀了数百万人一样。推动资本主义和它的影响变得更为明显和明显的拒绝的策略-通过侮辱来提高意识-是一些”开悍马车的小混混”的狗屎，几乎没有新的或异端，而是一种平庸。在左派的古老传统中，这是一个特别的纸板作品，他们无法想象除了世界末日之外的任何动机。

当然，并不是每个加速主义作家都会犯这样的错误，即过于关注要加速的进程到底是什么。有些人说的是很平淡的东西。MAP将其最明确的重点放在了技术发展上，当然，这很好！但我应该注意到，目前的情况是，在技术发展方面，有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尽管我应该注意到，目前最重要的技术创新和创造力已经在资本主义日益严格的桎梏之外产生。我不确定通过组织和授权浪人博士和自学成才者通过世界各地的黑客空间和激进中心来深化这一点是否真正反映了”出路是通过”的概念。

但到了《加速主义》读物出来的时候，重点已经扩大到”加速[资本主义]的连根拔起、异化、解码、抽象化的倾向”。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手舞足蹈的语言有时归结为不过是呼吁更多的理性和策略-必须承认，这可悲地符合革命的立场。但是，我们有充分的

在那些采用具体语言的时刻，新反应主义的冲动也一直是快速地宣称什么是事实，而忽略所有其他可能的解释。当然，新反应论者作为一个整体来自许多方面，一些曾经的超人类主义者在意识到给予人们更多手段的不可避免的解放性结论时对许多技术感到退缩，但尼克-兰德的项目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大陆哲学最糟糕的倾向的产物。我们也不应该感到惊讶。加速主义作为一个术语有一个虚无主义的历史，这是兰德和其他加速主义作家在这个过程中有意识地呼吁的背景。

虚无主义，就像上帝一样，通过最终作为一个认知的停止，一个摆脱思考的借口-被拼命地援引而不是反思，来释放精神压力。因此，它要么继承，要么形成任意的反馈回路来保护这种大脑死亡的状态。在新反应论者那里，这种情况通过他们对提供模型的最快捷方式的渴求得到了体现。援引认知科学来”解释”，而不是从根本上探究。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迅速地被否定为信号、仪式、智商或种族或其他什么。仅仅在可以快速创建分类法或仅仅是故事的情况下寻找动力，并阻碍任何可能导致竞争性假说或全新可能性的进一步研究。

与这种反动主义相比，人们可能会在许多层面上提出对”去领土化”和”释放的流动”的实际的、全力以赴的拥抱-不是作为一种虚无主义的立场，放弃并接受任何漂移的东西-而是作为一种全面警觉的立场。这种警惕最终是概念或计算景观中唯一坚实的东西-作为一个方向而不是一个点。它坚定地不是一个深渊。要使警觉意味着无尽的虚无，就必须采取虚无主义的立场，即一旦你抛开所有任意的附加物，所有的论点或观点都同样可以相互映射。在元欲望的流动中不存在元结构或普遍的独特性。这样一个完全平坦的情况当然会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有序情况，因此是一个不可能的随机拓扑结构，但虚无主义者坚持这种平坦或无意义的错觉，以此作为借口来摆脱警惕性的进一步探索。只是默认他们目前容易出现的任何本能或冲动，而不进行过多的审查。有时这导致了一群倦怠的人集体试图保持他们以前无治主义生活的友谊和审美特征。其他时候，它导致书呆子新纳粹分子谈论白人和’阿尔法’男人将在文明崩溃后如何统治。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投降都是一种概念性的地方主义-在偶然的圈子里徘徊，或者仅仅因为你碰巧居住在那里而坚持在当前的位置上，把任何世界旅行或勤奋的探索当作一种浪

们正在做一些事情。我不确定你们对此有什么贡献。除了为那些被困在同一话语中寻求逃离沉船的人打开大门。

在激进主义和那种无休止的网络穿越和循环分析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这种分析对于在复杂的基本动态之上飘荡的话语中获得零散的铺垫是经常需要的。后者可以迅速成长为癌症，反映出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所说的那种对”解释的深度”而不是实际相关性的专业迷恋。

加速主义理论家们通常都有马克思主义的谱系，因此他们借用马克思主义的倾向来谈论全面的宏观结构或其他大规模的表象，拒绝处理潜在的伦理。这是一种更广泛的恼人的倾向的一部分，即试图从自己的直觉中得出规范性的结论，以回应某些全面的印象，而不是从任何种类的基础性的道德取向中得出。就像很多左派/原教旨主义的论述一样，他们似乎没有能力制定任何类型的伦理诉求，而不仅仅是设置相当明显的直觉泵。例如，请看今天左派的主流论证模式，即通过能够以某种模糊的方式将某一特定事物与帝国主义或性别主义等大坏蛋联系起来而证明它是坏的。这种联系有多微弱或无关紧要并不重要。我们对”资本主义”有一束模糊的印象。这一束是坏的。因此，任何我们可以与该束的任何方面进行模式匹配的东西也同样是坏的。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能认识到这种论证模式在面对它时是多么可笑，但它对那些被灌输了对还原论的敌意的人仍有一种隐秘的吸引力。问”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的这一大堆东西的核心具体问题到底是什么？”是一种神圣的行为。当更多的激进传统想要把词语分解成不同的、清晰的概念时，大陆人正确地推测，那种清晰性会破坏大部分人文科学的贵族游戏。

因此，这种大陆取向一次又一次地导致—尽管它宣称反本质主义—相当不可避免地走向反动的尝试，以确定和接受某种不可还原的”人性”或”人类经验”，它不能被真正拆开或重新配置，因此没有真正的自由度。

大陆哲学家尼克·兰德既是现代右翼加速主义的创始人，也是新反应主义的创始人，这不是什么奇怪的怪事。恰恰是他的大陆根基为这种法西斯主义提供了一个基础。通过非常全面的抽象和宏观的分析形成一个世界的模型，并接受最先出现的解释或叙述，而不是深入地寻找重塑和改变事物的方法，这正是激进主义的极致。即使

理由怀疑这种朦胧和笼统的语言，以及对传统上具有负面含义的术语的选择。加速主义在历史上意味着加深资本主义的恐怖，直到达到一个突破点，这就不可避免地将所有其他”加速主义”集中在这个观点上。无论人们想提出什么其他论点，这种与”使事情变得更糟”的联系一直是加速主义的主要视角，也是几乎所有关于加速主义的讨论的核心所在。

这样的框架并不代表与左派的原始主义腐朽完全决裂。对理性、科学还原论、战略和技术发展的热情拥抱—简而言之就是我们的创造力、警惕性和代理权的最亮丽的表达—不应该被说成是”在事情变得更好之前让它变得更糟”。

这里的关键之一是，加速主义在他们自己使用的”资本主义”中保留了与”文明”中著名的轻视性归类的倾向。

但是，”资本主义”—在资本积累的宏观趋势、正常化的工资劳动和随之而来的动力的意义上—如果有的是与创新和有意义的增长完全相反的。这不是资本主义有内部矛盾的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和市场是完全不同的生物。资本主义的积累和集中化趋势只是我们社会中众多力量中的一种，它决不是交换的微观动态中固有的产物。然而，加速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可以称其为原初主义，因为两者明显是相辅相成的—的倾向，将现有社会的全部特征概括为一个由紧密的整体部分和一个目的论弧线组成的单一野兽，而不是一个混乱的战场。

这种轻率的反归纳主义倾向，喜欢松散的印象而不喜欢激进的分析，也许是人文学科中一个孤立的学术品牌的最有害的特征，当马克思主义在其他地方无法抗争时，它就逃到了这里。现在所有的酷孩子都在一个学术坟场里玩耍。长期以来，它一直同情贵族阶层的原始主义倾向。像所有滥用权力的生态系统一样，这块学术飞地对任何清洁的客观性或清晰性的暗示都怀有深深的敌意，因为这可能为支撑权力动态的气功和战略不沟通留下空间。它想要的只是为被剥夺权利的人提供坚实而普遍的基础，更不用说为社会等级制度提供阶梯的各种信息稀缺性的消解了。从根本上说，原始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拥抱了上个世纪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强烈涌现的神秘主义。

任何与原始主义的彻底决裂都必须包括与这些蒙昧主义和反还原主义的怪物决裂，然而加速主义却对他们的许多腐朽的假设低头

不语，含蓄地将理性描绘成我们必须接受或推动的部分负面的东西。现代加速主义者的语言始终是隐含的歉意，对应该强调积极的东西使用令人不安的措辞。

对资本主义的唯一激进的政治反应不是抗议、破坏或批判……而是加速其根除、异化、解码、抽象化的倾向。

最令人恼火的是，加速论者说“我们应该拥抱科学和理性”，但却没有真正费心去实际论证为什么。尽管他来自一个两者都被广泛妖魔化的环境。其结果是，人们似乎要么毫无理由地拥抱科学和理性—作为一种情况下的权宜之计或随机的怪癖，或者因为它现在很时髦—要么就被发现一直在等待某种许可。如果是后者，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一个人已经被说服，为什么还需要一个借口？热情拥抱科学和理性当然有很好的理由，所以这种胆怯是令人不安的。这很像发现一个邪教幸存者犹豫不决、畏首畏尾地建议：“也许，有点像，这实际上并不好，也许也许吃婴儿，有时。”当然，你可以同意他们说吃婴儿是不好的，但他们谴责的主要结果应该是倾向于在托儿所周围盯着他们。

当然，人们可以更有同情心。在有些时候，人们只想把一些无治主义经济学交给那些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长大的营养不良的学者。毕竟，通过区分市场力量的去地域化和资本主义力量的再地域化，很容易挽救反恋母情结的语言。当然德勒兹和加塔利有效地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的一部分，但这既是真实的，也是不真实的。资本主义和市场不仅反映了急剧不同的基本概念和动力，而且在真实的现存世界中，它们往往是可分离的动力或处于严重的冲突之中。当然有一些方式，解放的市场力量在结构上被利用—作为国家/资本主义权力引擎中的一种液体燃料。但在其他方面，情况远没有那么稳固或解决，在这些方面，一种力量没有被另一种力量收编和奴役，但在这些方面，它们是正交的过程或相互争吵。

扩展到市场无治主义者所称的“市场”之外的更广泛的东西，如科学和理性，这种去地域化的流动可以被看作是蜂巢式思维的出现—思维努力地捅出更多的洞，穿过笼子的墙壁，使它们保持本地化，进入一个更流畅的连接或融合中。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文化和其他记忆性的东西被视为僵化的、强加在社会上的化石，就像它们强加在个人的思想上一样。

的腐朽权力结构的酸，一直是吃掉资本主义和国家的先决条件。只有我们没有骨气的胆怯才让我们退缩。

当然，我们不应该对左翼加速主义对管理精英主义的拥抱感到惊讶，他们对人文学者的技术官僚制的渴求是非常明显的。就像几乎所有源自马克思的话语一样，其目标从来都是为了真正实现一个更好的世界。

加速主义这个词由来已久，然而它只出现在学术著作中，从未在现实世界中应用过。它是—我们必须解决房间里的大象—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学术立场。在大陆哲学的话语之外是无法理解的，它是阶级的一种不可分割的表达。一个纯粹的集中的资产阶级精英主义与完全缺乏认真的诚意或还原主义/激进主义相匹配。在这个舞台上，热情的蒙昧主义鼓励了新的等级制度、新的权力关系生态、通过完全没有根基的自慰式语言云进行的竞争性定位游戏的普及。

这种话语或社区不仅仅是与科学相对脱节，它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迫切的需要，即在与科学的对比中定义自己。部分原因是它倾向于延续陈旧的视角，而不是重新开始或大幅度地重组分析。在一个非常现实的意义上，理论和模型在大陆话语中永远不会消亡；它所谈论的人文学科倡导的是一个仅由注释组成的附加系统。因此，与科学不同，它提供了一个固有的精英主义系统。它创造并迷信知识资本的人工经济，迫使人们在一个不断增长的典籍中苦苦挣扎，而没有真正把实际的要点简化下来，并进行适当的重组。这对那些想把社会分析当做唱片收藏的时髦学者来说是很好的—对那些资产阶级的2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他们有波西米亚的趋势，并在玻璃器皿是梅森罐的晚宴上寻找观点来支持。但是，尽管这些传统已经强烈地影响了作为个人阶段的活动主义和/或作为社区形成的货币的激进主义的游戏学校模式，这也是很多现代左派的特点，但它们对地面的影响绝对是零。

现实是—加速主义和其他痉挛的左派如此明显地回应的现实—目前开拓未来的人不是大陆学者和富裕的私立文理学院的人文学科专业。他们是无治主义的黑客和直接行动主义者。或者是科学家和工程师。

我想，大陆传统中的一些人已经完成了一条漫长的弧线，回到了理性和严格的“现代性”，这很酷，但当你们都不在的时候，我

技术上的限制。”我无法理解认真对待这一借口所涉及的研究性脑力劳动。或者说，“成功”不是用实际人类丰富多样的主观愿望来衡量的，而是用一些笨重的参数来衡量的，并以与 1970 年代的智利同时代的僵尸资本主义国家之一来衡量。我很乐意承认，现代赛博斯人可能会设法建立一个能够避免苏联大规模饥饿的社会主义，因为与先进技术相比，粮食生产的变量相对较小，人类的饥饿或营养需求相对恒定。但是真的吗？如此崇高的愿望。

我多么希望我能报告说，MAP 的专制转向仅限于在阿连德的星际迷航桥上写一些可疑的经济历史迷信，但 MAP 非常清楚地表明，它想把任何类似于水平主义或分权的东西和地方主义一起撵走。

在有效的政治行动中，保密性、垂直性和排他性都有它们的位置……我们需要在分布式的水平社会性形式之外建立一个集体控制的合法垂直权威，以避免成为暴虐的极权主义中心主义或超出我们控制的反复无常的新兴秩序的奴隶。

……我相信这将完全奏效，因为我们已经确定这个虚构的宇宙是靠魔法运行的。

我们并不完全清楚这里发生了什么。作者是否从表面上接受了荒谬的说法，即反权威主义或抵制国家权力扩张的唯一途径是地方主义的卢德主义？他们是否以某种方式将国家权力的扩张与反馈性技术发展的加速混为一谈？不管是什么情况，这种分析对原始主义意识形态的拒绝并不比戴上邪恶的胡子和加入一个该死的公司可能更多。

人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专制主义的冲动在起作用，还是作为学者的作者被他们的阶级地位深深地扭曲了，以至于当他们被逼问到前进的道路时，除了建立一个“知识分子基础设施”或先锋精英—还要求政府资助智囊团，我不骗你—来推动它之外，没有别的办法。这是一场闹剧，任何人都可能声称要摆脱 20 世纪的原始主义感染，但却从未参与过无治主义和现在互联网时代的驱动力，使每个人都成为知识分子。然而，加速主义再次掩盖了同样的原始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倾向，即压制复杂性而不是拥抱它。

如果真的像 MAP 所宣称的那样，“宗派主义是左派的丧钟”，那么我认为我们应该尽可能多地拥有它。如果有什么东西要被加速，那么请让它成为宗派主义。一个分形的宗派主义，直到左派的尸体最终被溶解掉，无治主义被释放。发展一种足以吃掉我们自己

我当然喜欢这种话语提供的流动隐喻。但那是因为这种比喻能更好地反映出所发生的复杂情况。而这确实是这一论述中缺少的可操作的词。这些过程中最重要的指导和约束是信息理论。

当 MAP 断言：“

我们可能正在快速发展，但只是在一套严格定义的资本主义参数中，而这些参数本身从未动摇。我们只经历了局部地平线的速度增加，这是一种简单的脑力激荡，而不是一种加速，这种加速也是导航性的，是在一个普遍的可能性空间内的实验性发现过程。

你可以看出他们在为一些关键性的区别而努力。他们明确地抛弃了在运动的二阶导数方面对加速的具体定义，这与尼克·兰德项目的主题更为接近，并让这个术语渗出到一个非常松散和令人回味的概念中。

但这忽略了主要问题，即复杂性。我们当然应该在斗争中的探索和代理中主动意识和警惕，但这些并不是特别有见地的区分。当然，我们可以通过具体的有意识的方式来更好地推动和引导我们都在其中参与的社会奇异性，但它还是在发生。

正是这种全球反馈的文化、记忆和智力的复杂性，在我们对互联网时代的体验的核心，具有最革命性的意义。加速主义几乎完全忽略了这一现实。

MAP 宣称，“资本主义的速度一方面使领土分离，另一方面又使领土重新分离。进步在剩余价值、劳工后备军和自由流动的资本的框架内受到限制”。但是，资本主义显然没有成功地进行再领土化。我们的世界的复杂性正在日益失去控制。部分是指社会技术基础设施正在被无治主义黑客以比国家安全局更快的速度修补和扩展，但主要是指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已经催化成一个意识和细微差别的反馈回路，正在对固有的僵化结构和权力机制造成压力。正是在这里，无治主义者和超人类主义者已经确定了最肥沃的压力点。

就像有不可避免的物质现实制约和部分决定社会动态一样，也有不可避免的计算现实。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什么自 70 年代初以来，市场被激进主义者的兴趣爆炸性地视为反权力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自哈耶克以来，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在与这一不可避免的现实做着深刻的斗争，而默认的条件反射则变成了将所有的“控制论”作为有污点的意识形态伪科学而抛弃。但是，如果更理性的原始主



义者强调能量动力学对社会的基本限制是正确的，那么自由意志主义者也应该关注计算机科学对社会的基本限制。两者都是物理学的问题。就像你不能洗刷碳成本并假装已经消除它们一样，你也不能简单地洗刷信息和计算的问题并假装它们不再是一个问题。

一个寻求与左派的非理性的原始主义彻底决裂的项目，应该该死地解决它系统地无视计算复杂性的方式，更不用说它未能站出来并实际接受基于这种复杂性的分析。左派反而—随着它被始终潜伏在其中的原始主义所加深的腐败—拥抱了简单性。它的管理倾向与原始主义对智力警觉的厌恶（“我们以前尝试过思考/技术，看看它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形成了完美的结合。系统一次又一次地被批评为“太复杂”而无法理解/控制，同时又被嘲笑为机械而非有机。但机械和有机之间的唯一实质性区别是流体的复杂性。抨击生物圈“太复杂，太难完全理解和控制”有意义吗？当然没有。然而，市场、我们的技术或我们的文化越是有机、越是复杂、越是流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就越是胡思乱想。我们应该深化互联网时代人类相互关系的充满活力的、丰富的、茂盛的复杂性，不仅仅是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国家和硅谷科技巨头等权力结构会动摇，发现自己越来越没有能力控制，而是因为这种复杂性与解放的表达和体验密不可分。

在我们的话语、经济等方面释放解放的欲望之流，并不是要变成那可怖的东西，并加倍努力，而是要抵制它。

就像试探性的邪教幸存者一样，加速论者总是在找借口说“无法逃脱”。但事实是，很可能有一种以地方主义、鲁莽主义或反理性主义的方式逃离目前的状况，而这种向原始主义的逃离正是权力所希望的。

新自由主义对危机的关注，以及资本主义越来越多地呼吁将危机作为一种平坦化和减少社会复杂性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脉络。当正常的管理模式变得无法维持时，权力往往会回到向自己的民众投掷核弹，希望世界末日般的破坏能使情况再次变得更易于管理。

事实上，随着原始主义的逐渐消亡，我们看到的是资本和国家对技术创新和信息技术的狂热转向。因此，政治家和警察局长们呼吁彻底废除密码学和互联网的鲜明形象。当然，他们对任何摆脱了资本枷锁的市场的敌意，是一个长期的传统。权力憎恨复杂。

然而，各种类型的加速论者都有一种可悲的倾向，即把市场和理性描述为一种死亡。这个包袱很需要被甩掉。拒绝或故意无视市场所产生的计算问题—继续把市场描绘成一个死的”机械”东西或创造死亡，而不是从根本上有机地与资本的机械死亡进行激烈斗争的顽固倾向—导致拥抱集中的、过于简单和无机的解决方案，如”全民收入”。如今，每个人都对全民收入有某种同情—当然，没有人应该为了生活而工作—全民收入计划很可能是一种缓解性的改革，但通过强加更加笨拙的假象来解决我们目前地狱般的人为（也就是暴力的简单）稀缺性和资本集中，至少可以说是一种危险的做法。拥护这种做法会不可避免地导致专制主义的转向。

可悲的是，MAP在这一点上加倍努力，既拥护人为的简单实践，也拥护资本主义作为可能的人类关系的相位空间中的一个吸引者的人为的简单形象，几乎具有普遍性。

我们相信，任何后资本主义都需要后资本主义的规划。相信在一场革命之后，人民会自发地构成一个新的社会经济体系，而不是简单地回到资本主义，这种想法充其量是幼稚的，最糟糕的是无知的。

当然，作为追求更美好世界的不妥协愿景的激进分子，我们应该寻求绘制可能的地图，探索前进的道路和替代动力，更好地了解土地的布局和我们的选择，在任何可能的背景下，而不仅仅是我们现在的背景。但是，”规划”带有一个非常具体的遗产，那就是对复杂性的发脾气，以及极度缺乏想象力的委员会的授权命令。真正激进的道路必须从下往上开辟，而不是从雅各宾派的阅读小组往下开辟。规划假定了对可能发生事情的某种控制。它意味着从一整块花岗岩开始，凿出一个预先设想的数字，而不是让一个人通往一个更基本的目标的道路流畅地回应和适应可能的东西。规划并不反映一种创造性的导航，而是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老一套，需要强加一种任意的理论秩序，而不是真正做任何形式的实际科学调查。

我的意思是，我向他妈的上帝发誓，这不是我编造的，MAP本身实际上积极地引用了Cybersyn。人们很想慷慨地设想一下，在过去的五十年里，左派越来越多地转向原始主义，就像访问纳尼亚一样，现在的幸存者从那里出来时还穿着喇叭裤，想知道什么时候能吃上饭。但事实上，这种科学否认主义是没有任何借口的：”这两件事最终都没有成功，这可以追溯到这些早期控制论者在政治和